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海大悦读

2020年第1期 总第13期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2020年6月

共读共学品“云上”书香

——2020“海大人文”线上读书节启幕



春天如约而至。在 2020 年这个特别的春季，我校一年一度的“海大人文”读书节也如期降临。2020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8 日，由“海大人文”系列活动组委会主办、图书馆承办的以“共读共学 品‘云上’书香”为主题的线上读书节活动如期举行。

作为本届读书节活动之一，图书馆在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2020 年 4 月 23 日）来临之际，通过图书馆主页、图书馆微信等线上渠道正式发布《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2019 年阅读报告》。

本届读书节还包括“这个读书节 共读不孤读——经典共读活动”、“打卡 21 天·和名师相约春天里”、“第三届临港地区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竞赛”、“图书馆邀您荐购电子图书”等多项线上活动。

身体宅在家里，思想仍可遨游四海。2020“海大人文”线上读书节期待你的加入，让我们共读共学，共品“云上”书香。

目 录

卷首语	_____	
我为什么要读书	_____	4
阅读·观察	_____	
十年一刊：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	_____	6
名家推荐	_____	
朱自清	_____	13
书单	_____	
2019 年度“中国好书”	_____	15
书评	_____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等读后感想	_____	21
征文选推	_____	
白色巨塔是否仍然存在	_____	26
美丽新世界的善恶观——读《1Q84》有感	_____	28

卷首语

我为什么要读书？

◎南振中

大学生阅读不全是为了获取直接价值。有很多书籍，你去阅读它，获得的功效是间接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比如阅读基础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这类阅读的价值在于提高文化修养，陶冶性情，潜移默化地提升人的品格。

前些年，有人将阅读价值分为“功利性阅读价值”和“超功利性阅读价值”。“功利性阅读”指有实际功效的阅读；“超功利性阅读”则指短期内难见功效的阅读。这种划分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功利通常指眼前的功效和利益，含有贬义。就大学生而言，功利阅读与超功利阅读很难区分。为了准备考试，必须阅读与教科书相关的书籍；为了撰写毕业论文，需要阅读专业书籍；为了过级、考证，需要吸收大量实用知识。这算功利阅读还是超功利阅读？为了尊重大学生的自由选择，我避开了“功利”一词，把阅读价值分为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不知大家是否赞成这一区分？

判断阅读的直接价值比较容易。我们常说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追求的就是阅读的直接价值。郑大新传院 2014 届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陈同学，从研一开始写学术论文。他经常去学校图书馆，阅读专业书籍和各种杂志，研究不同学者不同的理论主张，探寻自己的理论框架。在校学习期间，陈同学先后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郑州大学研究生优秀科研奖，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二等奖。这是阅读直接价值的体现。

大学生阅读不全是为了获取直接价值。有很多书籍，你去阅读它，获得的功效是间接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比如阅读基础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这类阅读的价值在于提高文化修养，陶冶性情，潜移默化地提升人的品格，对于观察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也会产生深远影

响。2014年12月17日，我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与年轻记者就读书问题进行交流。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长江上游仍在砍树》（1998年）的作者熊小立、黎大东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原稿的导语是“正当长江中下游百万军民奋战抗洪之时，长江上游地区大片森林仍在遭受数千把斧头和电锯的砍伐”，新华社播发时删去了“正当长江中下游百万军民奋战抗洪之时”这17个字。当时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处理？我回答说：50多年前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时，教我们文艺理论课的老师引用过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中的一段话：“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百万军民抗洪这一事实在当时人所共知，至于砍树是否导致洪水暴发，记者宜披露事实，不应把结论性意见强塞给受众。要让倾向从典型事件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受众在读了新闻作品之后，经过独立思考，得出同记者写作意图大体相同或者相近的结论，这才是新闻作品感染力之源。这篇600多字的短新闻播发后，国务院发出了“停伐”指示。从1998年9月1日起，四川省6个地、州、市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几十年前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这算不算阅读的间接价值呢？

由于读者的需求和关注点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对其价值作出不同的判断。这有点像吃橘子：需要补充维生素C，橘肉有价值；需要美容，橘子皮有价值；需要通络化痰，橘瓤上的网状经络有价值；需要疏肝理气，橘叶有价值。在学习过程中，首先要确定自己读书的目的，了解自己的需求。这两点搞清楚了，对阅读价值就容易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本文选摘自《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新华出版社，2015年）

十年一刊：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

◎胡 泳

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生活》）的纪念文集《〈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细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种亲历历史的亲切。《生活》的历史充满了变化，书上有篇文章说陆续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后进出。这就导致能够完整地讲出这本刊物变化过程的人很少，纪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纳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除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那段时期以外。惟一的遗憾是看完后不太过瘾，我想这跟编书的初衷有关，记得约稿函上说是参与者个性化的回忆文字，不做宏大叙事，亦无全面反思。这造成此书记录的都是断片，一些重大的变化语焉不详，比如对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与新闻报道这一对“冤家”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等等。

编书者不求宏大叙事，但《生活》十年了，难免要从宏大叙事谈起。《生活》是顺势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创办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面寻找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简单地认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个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斯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段话拿到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说也完全贴切。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新闻媒体在那个时候并不凸显，反而是小说和报告文学高调地扮演着干预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开始担纲《生活》的朱伟，原来的职业正是写小说、编小说，小说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话语权。但是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眼球效应丧失，国人的精力被电子类产品和快节奏的生活瓜分。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文学孤城里的人又偏偏摆脱不了故步

自封，对脚下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漠，结果是留下了大块大块的空白给新闻人来填补。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酝酿创刊的时候本不想完全抛弃文学，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理想显然没能实现。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写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据朱伟说，当时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经他鉴定之后，再从他手中流给各等编辑。一九九五年《生活》筹备复刊，李陀是策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李陀后来对文学的评价中找到“三界”之文学界何以不能帮助《生活》成长的端倪。《上海文学》曾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至于说“三界”之学术界在《生活》发展中的出局，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汪晖与黄平都是《生活》筹备复刊的核心策划者，在谋划《生活》的办刊取向时，他们“强调杂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批判性职能，而且也希望这种批判性能够深入到某种我们所期待的程度”（汪晖语），其实这正是他们对媒体抱有的不切实际的“书生妄想”所致。

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英都划归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把媒体看作是“中性”的，通过介入媒体，知识界可以获得一种有别于官方的“市民空间”。换言之，他们大都认为发育良好的媒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充分的公共空间。

但现实却没有那么多玫瑰色：很简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互为工具的关系。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刺耳，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来做他的讲台或者论坛。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而言，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嗤之以鼻，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所谓“宽度达一英里，但深度却只有一英寸”。电视一定是给发言者断章取义的，如同布迪厄在他那本薄薄的小书《关于电视》中所说的，上电视就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题往往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也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电视存在很多歪曲，有很多强加给上电视的人的选择，任何在电视上露面的人，都会经受一种巧妙的审查。即便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以讲话机会，他往往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放，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在电视上露露脸或被收视即可，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要说点什么。“‘在’，就是被人看到”，贝克莱如是说。

与此同时，媒体也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者读者。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媒体的收入基本来自两条，第一条是广告，第二条是发行，发行跟观众或者读者也存在密切关系。观众或读者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媒体想要打动它的市场，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形成一种内容制造的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这个模式中生产一些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仍以电视为例，这一媒体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但电视在追求受众注意力的时候，必须使自己显得“有思想”，因而它着力于挖掘一批能够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布迪厄称之为“快思手”），

让他们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这种互为工具推到极端，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在我们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速食，媒体精英和经由媒体获得发言权的“快思手”结合起来，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无论如何，它肯定与汪晖们期待的“批判性”是大相径庭的。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自然，《生活》是不能也不愿脱下自己身上那层“文化外衣”的，朱伟自述，一九九五年筹备复刊的重大决策之一是，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评述不外乎指向两点，其一，让周刊在新闻类刊物中具备某种文化品位、小资趣味；其二，力图赋予新闻报道以某种思想深度，在力有不逮的时候，靠个性化的文字叙述来弥补。《生活》同仁巫昂对此概括得非常精当：

“《生活》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所有这一切，令《生活》变成一种难以明辨的气味混合体，但它也恰恰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九十年代中国媒体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杂志属于动作落后的，尽管《生活》的起步并不算晚，开始筹划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二年，但波折较多，未能夺得先机。电视的新闻节目当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最主流的媒体，它的起步始于一九九三年的“东方时空”；另一方面，新型的全国性报纸崛起，如《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它们认识到自己在新闻报道的迅速性方面比不上电视，开始针对新闻大量刊载解说、分析与评论。《生活》就是在这两者的夹攻之下慢慢成长的，当然，事后来看，幸亏三联书店的领导决策得早，致使《生活》获得了一个比较长的成长期，要是推迟五年再办，恐怕各种因素都不会容许这样一本杂志慢慢长大了，更何况它早期那么体弱多病。不管怎么说，三联书店的坚持与灵活造就了《生活》的奇迹。

一九九五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这些印迹，用《生活》同仁王锋的比喻，叫“胎记”，而“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做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做profit（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媒体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

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二〇〇四年的数字是，全国共有两千一百三十七种报纸，日报发行量八千五百万份，排名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实事求是地说，媒体年代里的媒体不容易。有些话我们不能随便讲，但如果我们讲得不精彩，市场则拒绝埋单。要学会在夹缝里讲，不会出事，又有人看，所以在中国搞媒体的奇招迭出。《生活》要成为主流期刊、“时代大刊”，这种艺术大约是不可不学的。

十年前，《生活》面临电视和报纸的两大挑战，它活下来了，活得有滋有味；下一个十年，《生活》再上一个台阶的难度，说不定还超过它前十年遭遇的困难。新的挑战至少还可以说出来两个：一是原来的国内竞争可能会演化成超出国内的竞争，国际路径的打通，资本通道的接轨，现代化的经管体制，这些都还在周刊面前横亘着，不是说搬出了小胡同，进了写字楼，手工作坊就成现代作业了；二是冒出了新的媒体对手：网络。我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至少《生活》前期的大部分同仁是存在印刷品拜物教的。我们拿到新出版的周刊时真是爱不释手，我至今还记得李陀当时陶醉的样子，我自己收藏着创刊以来全套的《生活》周刊。这种感情像中国古代的“敬惜字纸”，但电脑时代解构了这种东西，我其实也在力推网络时参与了这种解构。在互联网、即时通讯、博客等等的挤压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现在三联书店的杂志尤其是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这是好事情，也是我所说的传媒时代取代

文化时代的例证，但未来的增长点，希望三联像当年做出杂志决策时一样，提早动手培养，未雨绸缪。

说到网络，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大众文化本身是有暴力的，在网络这种新媒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网络话语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少数人的意见在这一话语体系里可以被认为是多数人的意见，比如《生活》曾经报道过的，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五日，新浪网上《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机动车负全责”条款在网民的投票中认为不合理和合理的得票比例为悬殊的 90.85%对 0.45%。那些既无公家车可坐，亦无私家车可开，天天坐着公共汽车或者骑着自行车甚至只靠两只脚走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为生存奔波的最广大的民众，会有几人出现在这 90.85%或者 0.45%中间？这一条款是否合理另当别论，这样的民意结果是否可靠却肯定是个大大的疑问。它说明，网络所反映的民意难言是真正的民意。第二点是，这个话语体系中，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所以说理的人要比那些只会谩骂的人更吃亏。网上世界很有些弱肉强食的味道，大部分情况下，“丛林法则”可以通行无阻。

网络带来了民主。我为此激动过，但发展到这个样子也的确似乎有问题。最近在读张东荪，觉得他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说得是真好：“中国人之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希望《生活》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生活》奋斗过的人的理想。

（摘自《一灯风雨：〈读书〉书人书话精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原载《读书》2005年第9期）

名家推荐

编者按：朱自清先生所写散文《背影》《春》《荷塘月色》等选入中学课文。然而使我尤其关注朱先生的除了上面几篇学过的课文，就是在好友闻一多去世后，受校方委托，拖着病体编写《闻一多全集》，而不顾自己的文章。这样高尚的人格，使人不能不对他文学上的成就多写一笔。他散文成就高，也写过小说，诗歌也不少。本文选诗歌两篇，以反映朱自清是新文学奠基人“多面手”的特点。（参考：高远东编《朱自清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现代散文家、语文教育家、诗人，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江浙一带的多所中学任教，并加入文学研究会，与俞平伯、叶圣陶等结下深厚的友谊，进行志同道合的文学探索。1925年任教清华大学，学校南迁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1946年清华复员，他拖着病体再任中文系主任。他写过诗歌，写过小说，散文最多，成绩也较大，在语文教育方面独树一帜，贡献巨大。



盛年

盛年今已尽蹉跎，游骑无归可奈何！
转眼行看四十至，无闻还畏后生多。
前尘项背遥难望，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馀勇，漫将顽石自磋磨！

悼一多

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原始人有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你自己，
遗烬里爆出新中国！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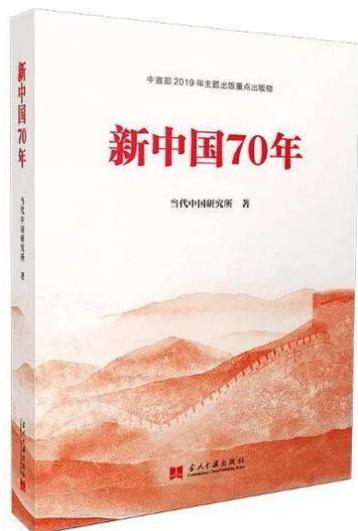
2019 年度中国好书

4月23日，2019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十套播出，节目运用虚拟演播室、云录制、云采访等方式，实现场景转换。《2019年度中国好书》是在中宣部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是《中国好书》盛典的第七届。

从获奖图书来看，2019年度中国好书共37种，分为主题出版类、人文社科类、文学艺术类、网络文学、科普生活类、少儿类，另有两种年度荣誉图书。节选其中13部，来源于《出版商务周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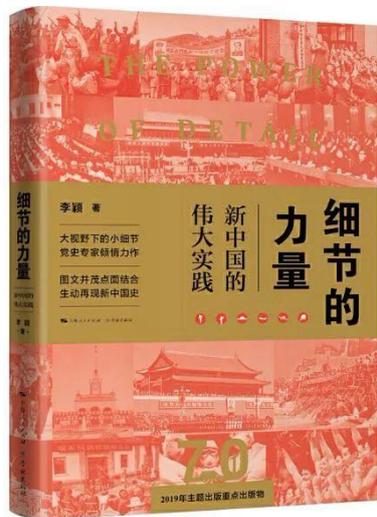
1、《新中国70年》 / 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紧密联系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全景呈现70年伟大飞跃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70年跨越发展的伟大奇迹，深刻揭示70年历史变革的宝贵经验。全书史料真实准确、数据严谨详实、细节鲜活生动、语言平实顺畅，讲清楚了历史怎样走来，又将怎样走下去，讲清楚了为什么中国道路为什么走得对、行得通，是一部权威的新中国史著作。



2、《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 李颖，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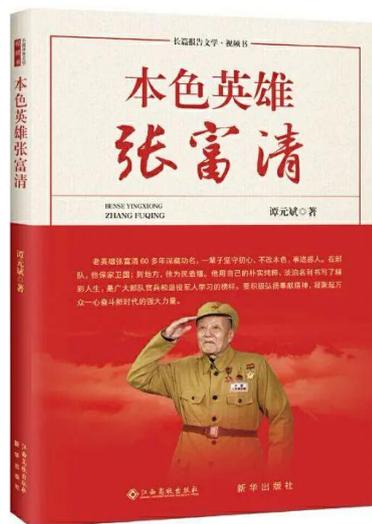
推荐语：本书选取对新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重要推动作用的45个“大事件”，用“大事件”串联新中国历史，以“小细节”解析“大历史”，用事实说话，让细节发光，力求在细节呈现上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把那些鲜为人知或者知之不详的



历史现场、幕后情节、事件脉络准确还原出来。本书图文并茂，既具宏大叙事，又有洞幽烛微之细腻，是一部让普通读者愿意翻的简明新中国史。

3、《本色英雄张富清》/谭元斌，江西高校出版社

推荐语：革命战争年代，他冲锋在前，是功勋赫赫的战斗英雄；和平建设时，他大公无私，是任劳任怨的人民公仆。他就是多年来深藏功名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本书作者经过多次深入采访，以丰富的事例、生动的语言，还原了一个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英雄形象。用事实和真情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是怎样成长为可亲可敬的英雄。这位老英雄值得许多人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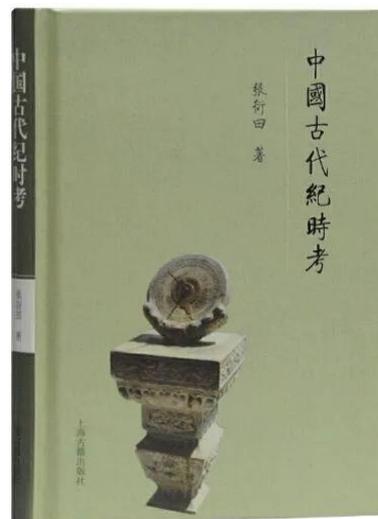
4、《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

推荐语：作为江南闺秀和北大才子，樊锦诗本可以有更为轻松闲适的人生，她却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洞中光影，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在这本自述中，樊锦诗娓娓而谈，分享她在北大的求学往事、与伴侣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以及敦煌文物考古和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质朴的外表，纯真的笑容，用尽一生保护的璀璨的敦煌文明，都源自她高贵安顿的灵魂和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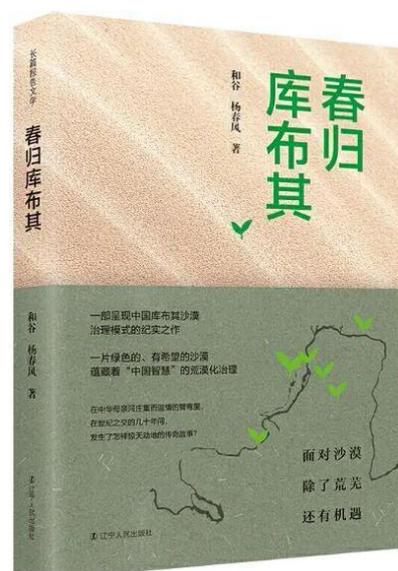
5、《中国古代纪时考》/张衍田，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分为纪日、纪时刻与时辰、纪月、纪年四部分，参考甲骨金石文献，概述了古人的时间意识、时间认知以及纪时方法的演进，还涉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等与时间相关的重要问题。文风平实、条理清晰，内容详实，是一本颇具可读性和知识性的“大家小书”。



6、《春归库布其》/和谷，杨春风 辽宁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自古以沙海著称，如今绿洲重现，创造了人间奇迹。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再现了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成功实践，同时用事实证明沙漠治理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方案”是高效而又可复制的，以此为国际社会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全书笔调沉稳，感情深挚，融科学认知与人文哲思于一体，谱写出了一部气势雄浑的治沙史诗。



7、《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贺雪峰 东方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以全局视角解读乡村振兴战略，以实地案例审视乡村未来发展，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围绕着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从社会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及组织再造等方面，对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了乡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又指出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全书视角独特，观点鲜明，切中肯綮，发人深省，不仅丰富了学界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成果，同时对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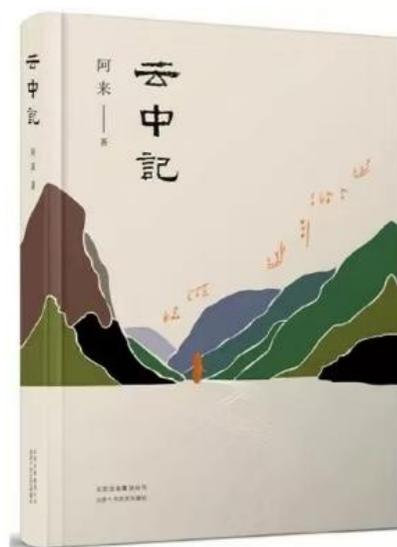
8、《庄子的世界》/王景琳，徐甸 中华书局

推荐语：《庄子》既是一本充满哲学思辨的书，也是一本剖析安身立命之道的人生智慧书，更是一本汪洋捭阖的文学书。本书从文学的视角出发，以专题的形式，对《庄子》中重要而有争议的概念和意象进行自出新意的辨析和阐释，使原本深奥晦涩的文本变得浅白透辟。本书论从史出，考证严谨，无论文学爱好者，还是哲学爱好者，都能从中取精用弘，洞悉“庄子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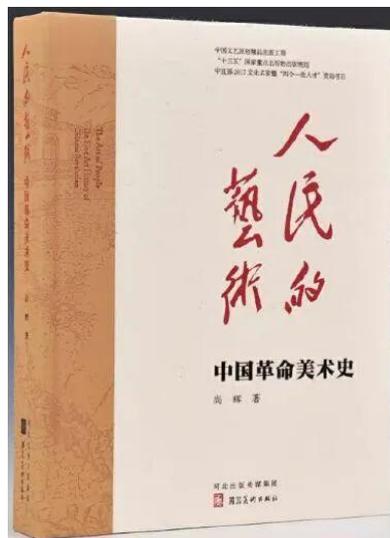
9、《云中记》/阿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推荐语：阿来酝酿十年，一气呵成，纪念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作者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以虚构的云中村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命运的悲怆，并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神性的辩证思考与叙述中，探寻了灵魂的抚慰与精神的重建。作品行文流畅，情感饱满，意涵丰富，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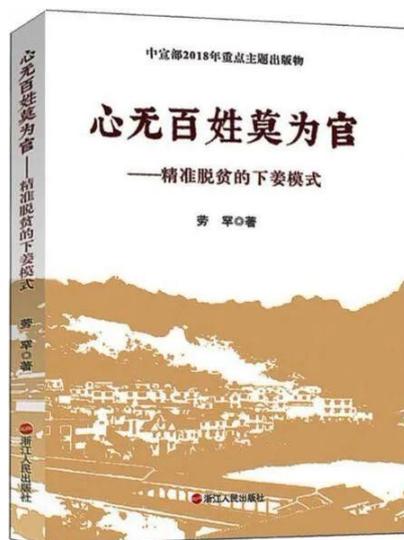
10、《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尚辉 河北美术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从历史与艺术两个维度回溯中国革命美术，用作品还原历史，用历史解读艺术，系统地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美术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创作特点及时代意义，诠释了“人民的艺术”的深刻内涵。全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书中所选的大量经典美术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能引起几代人的情感共鸣，不仅是一部革命美术的艺术史，也是一部由视觉图像汇聚呈现的中国革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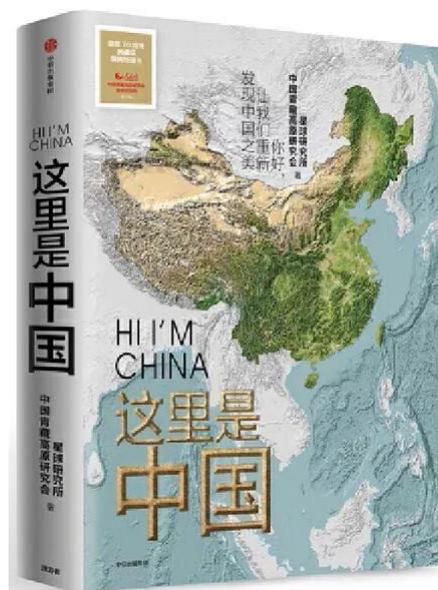
11、《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劳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长篇报告文学《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聚焦于小村庄的个案，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下姜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全过程，生动地展现了当地党员干部“心无百姓莫为官”的为民情怀，深刻分析了最终成功脱贫的原因，并特别强调了在生态保护理念下催生的新发展模式。本书以一个乡村的变迁，折射时代的发展，并将具有典型意义的“下姜模式”中可复制推广的扶贫经验归纳总结，为其他村庄提供宝贵经验。



12、《这里是中国》/星球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中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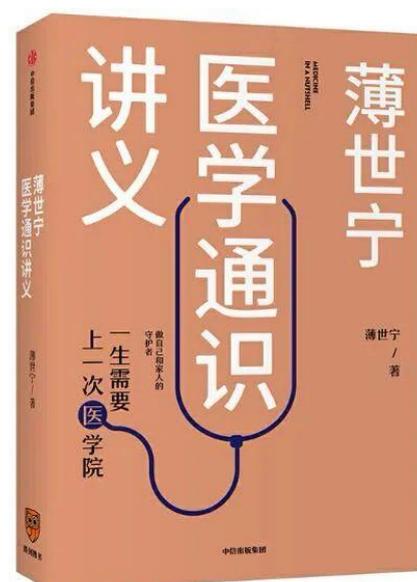
推荐语:本书是一部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地理科普作品，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与城市，以 365 处美景的照片和 53 幅专业地图为支撑，全方位展示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地理大格局。由“中国从哪里来”开篇，以“什么是中国”为回应，从可可西里写到江南，将山川河流的肌理与人间烟火的温情置于宏大的时间尺度下，让读者在唯美的观感中，了解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种气质与温度。本书不仅在知识上由专业团队把关，在制作上也



力求完美，无论是用以展示札达土林全景的长达 1.8 米的拉页，还是有助于呈现跨页彩图视觉效果的光脊锁线装帧，都表明这是一部值得珍视的匠心之作。

13、《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薄世宁 中信出版社

推荐语:人类何以需要医学？疾病对于生命意味着什么？医患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本书从医学的基本共识讲起，探讨疾病的原理，介绍医生的决策思维，也分析了患者思考的常见误区，使普通大众在获得更多医学常识的同时，更好地理解医生的诊断方式与治疗方案，以提高医患之间沟通的效率，使患者的就医决策更符合其长远利益。作者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湛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帮助读者汲取医学的智慧。



书评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等读后感想

◎张奎勇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正好书架上有《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读了不忍释卷。使我对对总理先生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感到钦佩，对总理先生的工作方法和能力由衷赞叹，总理先生面对记者、接待外宾的坦诚和个人魅力，会让人感到由衷高兴。最后找来“讲话实录”4 册和“答记者问”，对总理先生的工作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上海和中国的真实处境，“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画卷有了直观认识。因此，我很乐意把它介绍给还没有阅读此书的读者，以及愿意多一个角度了解我国“改革”和“开放”的朋友们。

1988 年初，朱镕基由国家计委副主任调任上海市市长。第一项抓的就是他在国家计委就主抓的“大众”汽车国产化项目。这个项目以引进国外技术并消化逐步提高国产化为目标，它是以上海为中心，周边省市有关企业作为配套的汽车工业体系化项目。它的每一步推动都离不开总理先生的思想工作、方法措施和调研指导。这个项目的成功不仅使得大众汽车国产化，打进国内外市场，为上海改革提供了税收、赚了外汇，而且它为上海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组织经营树立了榜样和信心。

接着 30 万吨乙烯、程控电话、电机产品、集成电路、纺织等大型和重点项目相继推动，救活了相关工厂企业和行业，积累了利润，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积累、技术和管理经验。总理先生作为市长，作为从事经济工作多年的领导，在这些重大项目的推进和改革中发挥了主动的思想动员、战略布局和技术指导的率领作用。他一直强调产品质量、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减少积压生产，通过技术改造和企业积累进行自救，发挥企业领导的带头作用，激发工人的创造性。他强调企业要面向市场，通过改进产品样式和品种，采取“奖勤罚懒”的激励措施，通过银行融资和合并转移进行自救，根据上海生产原材

料缺乏、教育和科研优势的特点生产用料省、技术价值高的能够开拓国外市场的产品。

在走出去方面，总理先生非常重视。一开始就定位上海不仅要放眼全国市场，跟广东、北京比较，同时放眼国外，将产品打出去。通过市场定位和政府下放权力，加强外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形成产销一体、工贸结合的走出去战略。这个战略涉及到企业内部改革和向外走出去，政府领导思想解放、权力下放，减少对企业的摊派和指挥，从计划经济真正转轨到市场经济，从大锅饭到待遇有差别，从被动到主动。观念转变和面向市场发展的战略是总理先生在大会小会和调研时候一直强调的。同时他还强调工厂领导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自己首先要不断学习管理，了解市场，廉洁奉公，在企业经营极其困难情况下，属下和群众才会听从指挥和改革，大家一起发挥工作积极性。

除了抓大项目逐步改变企业经营状况和“走出去战略”。总理先生到上海初期的主要工作还有稳定物价、建设“菜篮子工程”（包括郊县农副产品基地建设，国营菜市场改革等）；全面改善交通拥堵，出租车和公交车治理整顿，借鉴北京、天津的经验规划建设城市环线，治理城市环境卫生。这些举措关心老百姓的“吃”和“行”，还改善了上海的城市形象。接下来是住房制度改革，居民煤气管道建设。围绕这些项目，总理先生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重视群众来访，紧抓廉政建设，上海市政府带头管住 500 个局长，理顺职能，逐步下放权力给郊县、基层和企业，50 万以下的外资项目由区县审批。减少对企业的命令，政府在城市规划、宏观协调和加强监督上抽出更多的精力。

这些针对性措施实施后，老百姓受益，振奋了上海人民的精神头，尽管物价还不稳定，企业还未完全脱困，但是政府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当 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时，上海采取了依靠工人维护交通市面秩序而没有采取“军管”的策略，总理先生发表电视讲话，取得了群众的支持，风波很快平息，上海保持了稳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改革启动和民生项目建设初期，上海面临不少困难。包括企业脱困和上缴税收的困难，另一方面亟需资金和外汇。因此引进外资成为政府工作的

重要内容，包括世界银行的贷款，借鉴香港融资经验，这还为银行金融业在浦东开发中的发展提供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外资利用的手续简化，由多个部门审批尽可能集中审批，抽调精兵强将新组成外资工作委员会，继续推动完善虹桥、闵行经济开发区建设，为顺利吸引利用外资打开了窗口。此后上海企业创汇和利用外资连年增加，为引进技术和国际结算提供条件。

1990年物价稳定，经济平稳后，上海又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谋划浦东开发开放的棋局。在这盘大棋中，上海市将浦东开发与企业改革、交通改善、住房改革、外资利用、基础设施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结合起来，继续转变观念，不断改革，扩大开放。具体是将产品积压和老旧的厂房搬到浦东，通过级差地租来获得企业搬迁需要的资金，并且规划建设南浦大桥、过江隧道、城市环线，为浦东开发搭建骨架基础。鼓励浦西的工厂、宿舍搬到浦东，与此同时改革企业管理经营，搬迁即改革，改善浦西的交通、卫生和绿化环境，重新树立上海的都市形象。在政府组织、企业领导率领下，各行业人员和群众团结下，外资利用和国家政策综合作用下，浦东开发开放的画卷紧张有序地铺开，上海市的改革开放进入了良性循环，有些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了广东。

总理先生在市长任上，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增进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上海改革开放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外国公司踊跃到上海考察投资。同时注意使用政府顾问、职业顾问和咨询公司辅助决策和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外资和金融政策。加上上海的人才和管理技术，各方面事业有条不紊地开展。

作为长期从事经济规划的市长，总理先生在上海后期兼任市委书记，他不仅懂经济和管理，而且做起思想工作言简意赅，很容易为人接受。主要因为他带头廉洁奉公，属下和群众信任他；他目光长远，知识丰富，善于吸收意见，果敢决断，措施具有针对性。

当1991年朱镕基市长调到北京主管经济后，他不时提到上海的做法。当上副总理，就遇到物价上涨和经济过热问题，因此继续推动全国企业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东北地区企业脱困和三角债清除，以稳定物价，救活国有大型企业，保持经济合理发展。此间推动粮食收购、销售改革，企业技术创新和

银行贷款利用。以及农业农村“费”改“税”、打击走私、分税制改革、金融监管，活跃并稳定市场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发展第二产业，稳定第一产业，开拓第三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贷款给东亚国家，出口和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影响，但也因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和信任，加快了我国引进外资和开放的步伐。同年成功收回香港。

当选总理后，朱总理推动的重点工作一保、二稳、五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发力。世纪之交，我国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邓小平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当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国家投资重点转移到中西部，尤其在铁路、公路、生态环境、农业、加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民族和边疆地区开发开放，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投资建设。与此同时我们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

1998年是特别的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消退，我国夏季爆发了从长江到松花江流域的严重洪涝灾害。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军民团结击退了洪水。当记者问及最感动的事情，总理回答是“人民解放军跳下水用身体堵缺口”。1999年《为了谁》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尽管洪水造成严重损失，可是团结一心的抗洪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央随即启动大江大河堤坝修缮和治理工程，湖垸搬迁、退耕还湖、退耕还草还林修复生态。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国家储备粮充裕，有条件“以粮代赈”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作。这个举措遏制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千禧年重要的工作还有入世谈判，当然最艰难的是跟美国的谈判。这需要领导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加入WTO，国内各行业将面临巨大竞争，许多国人认为是“引狼入室”；当然还面临各国“加快各行业开放”谈判要求，我们一再退让，但坚持吸取1997年金融危机东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外资准入等各领域要有5年缓冲期。今天看加入WTO是利大于弊的，我们知道“花朵不能总生长在温室中”，勇敢的舵手都要到大海里才能击起波浪。但是彼时总理先生也担心，正式加入WTO的前夜，记者问总理先生是不是很高兴。犹

豫了一会，总理先生说自己其实有些担心，担心农业。因为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用不着担心；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谈不上冲击的问题；只有农业比较薄弱。

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世纪之交的各国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他们也担心中国将来是强有力的对手甚至是“威胁”。在不同场合总理先生表达了我們即使富裕起来也不侵略的立场，介绍国内的情况，增进同贸易国家的了解和信任。总理先生先后访问了美国，在人权和法治、WTO 谈判、知识产权保护 and 台湾问题等方面回答各界的质疑和疑问；他访问日本和韩国，促进与两国的合作与交往；访问东南亚各国并加入“1+10”和“3+10”；访问俄罗斯，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访问欧洲，加强同北欧、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合作；访问埃及和土耳其，加强同他们的合作等。

世纪之交其他国家是羡慕我们的，因为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加入 WTO，北京申奥成功，上海取得 2010 年世博会举办权，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们对中国由好奇到重新认识，到了解与合作。

与开放初期相比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们不能不对总理先生采取的果断改革事业表示钦佩，不能不对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表示拥护和钦佩，对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表示钦佩。回过头来看，正是 20 世纪后二十年和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的改革开放，强有力的机构改革，果断的中央领导和改革开放的实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绩和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尽管还要改革，但是我们有信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取得进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如果你想对“改革开放”有较直观和全程式了解，如果你想回顾重大事件，如果你想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题目，如果你想多一份优秀共产党员的生动学习材料，如果你想近距离感受国家领导人的心境。那你不妨读一读《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册）《朱镕基答记者问》这六本书。相信你会获得很大收获，相信你能够温暖地感受到国家总理的心跳。它能够扩大你的胸怀！

征文选推

[简介] 推选的两篇为图书馆“2019 品书知日本”征文优秀文章。“品书知日本”连续举办若干次，征文面广，收到的优秀稿子多。每篇各有特点，这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和日本文化。巧了，我校外国语学院开设日语本科和硕士学位教育，图书馆拥有较为丰富的日文和日本作家书籍。本期选择2篇征文供读者“品读”。

白色巨塔是否仍然存在

——小谈《仁医》与《白色巨塔》¹

◎李紫嫣

“医乃仁术”在论述医德时常被引用，近来读到渡边淳一先生的《仁医》让我也不能想起了多年前欣赏的《白色巨塔》，同为医疗题材，后者描述的是医疗体制下为了爬向高处的勾心斗角，前者则更为贴近生活，是平淡日子里的点点光芒。

尽管随着岁月流逝，医学本身的进步与医疗手段的改变使得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缓解或解决，但是二者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依然存在且尖锐，人情世故是文学作品中难以回避的主题。

《仁医》开篇写的是厌倦了复杂人际关系的圆乘寺大夫选择从大学附属医院辞职后前往一家私人医院就职。或许在名利场上奔波的大多数难以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可人各有志，如财前医生是一个渴望名望和地位的男人，出身贫寒的他缺乏一种底气，但依靠着自己的志气通过奖学金读完医学院。从年少轻狂的信以为有绝对的实力就可一马平川，到后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游刃有余，他终于知道，唯有拥有权力，才可以实现梦想。渡边淳一笔下的这间医院仿佛被人遗弃了一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俨如武藏号战舰版的偌大建筑之

1 《白色巨塔》，山崎丰子著

2 《仁医》，渡边淳一著

中，街道呈直角南北穿越，巷内夹杂着杂货店、饭店、针线铺与小酒吧，浓厚醇正的市井气息从书中散发。

阅读这两部侧重不同的作品时，我往往会想，医院对于医生而言是什么？五十多年前，山崎丰子写这本书的用意在于揭露医疗界权钱交易的黑暗内幕、选举贿赂和医患纠纷中的丑陋与无奈，直至今日，我们时常都会思索，错的是人心，是制度，还是社会环境？如果制度公证、人人自清，那财前会不会就不因追求至上的权力而伤痕累累，也许，里见也不至于会因自己的温暖与善良被赶出浪速医大，也许无辜者还活着，单纯者无需痛苦，也许财前和老师从未反目成仇，和挚友也能向着救死扶伤的共同执着目标而奋斗努力。也因为大医院的阶级与利益，圆乘寺医生所面对的私人医院的就诊故事显得有趣而温情。以小人物难以启齿的一些病症进行叙述，将他们的恐惧与羞涩的平衡把握得恰到好处。梅寿司夫妇虽患上了梅毒，却也积极治疗，因这奇妙的缘分相识相知。

生活坎坷、社会复杂，但细腻与温暖的人也会出现在身旁。山崎丰子直白地拨开医疗行业的严苛苦楚与渡边先生温柔地讲述陌生又相互依赖的医患关系都是对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多元化又包容的世界。医生不是神，他们不会使人起死回生，他们在救人的同时也是在为了救赎自己；医学发展的道路是由无数人命铺就而成的，白骨森森，堆砌成塔；个人的世界观是不尽相同的，医生们或注重治疗结果、或注重患者心情，前者将自我实现的过程等同于患者实现，后者则是帮助患者自我实现，这是无法判断对错的两种方式，他们都是以自身所认可的方式为医疗的进步做出贡献。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作者必须顾及小说带给社会的影响，结局需要有其应付的社会责任。显然这两部作品都做到了，归功于两位在专业性与社会性上的思考与研究学习，读来一气呵成，毫无晦涩之感，医学门外汉的山崎丰子女士在医学术语、医疗纠纷官司等资料中苦苦搜寻以求专业性与真实感，渡边先生则是弃医从文，本就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在阅读后记的过程中也对医疗行业乃至各行各业的伦理道德的探讨中进行思考。当今医师的现状并不理想，私人

医生注重发财，大学附属医院过于注重技术或偏重于研究学问而缺少人文关怀，大型公立医院位居两者之间，比较中庸，如此现状难以一蹴而就地改正，只能是尽可能地使各方扬长避短，让破晓的曙光自窗外射入、闪耀无暇的光辉。

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水：“医学所治疗的不是病，而是患者”。在追求伦理道德现代社会，往往有人仅顾及了一方利益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导致矛盾的激化，这当然是不太可取的。我并不是专业人士，故也只能从个人情感来写写对这两本书的喜爱。我总是偏好于阅读日本文学，是因为醉心于其中真实的力量，哪怕是负能的现象，却也能详尽地展现人物的心理行为及背后的原因，真实性是直击人心的，而人性纠葛在关乎性命的医学界更为突出，那座白色巨塔在每个人的心中或许也都存在。

美丽新世界的善恶观

——读《1Q84》有感

◎卢焕兵

战后的日本或多或少地被冠以“后现代”之标志，日本后现代指的既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也是日本的国民思想——战后日本人与日本社会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日本社会充斥着无责任性、无战性和无辜性。正如在村上春树所著的青豆雅美的“1Q84”的世界里，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健常与畸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这个1Q84空间，却正是战后日本民众的心之所向。这是一个最高理想的国度，没有常人，没有怪人，没有应该做的事，没有纲常伦理，没有道德标准。

有时候，感觉村上的文字似乎并未按照常人的逻辑或世界的思维模式，他的作品，恶人不恶，善者不善。女主人公青豆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健身教练，同时也是一个替柳宅的老夫人杀人的职业杀手，以暗杀虐待女性的男人为天降之己任。充满正义感的青豆早刺杀心中一直认为恶贯满盈的性侵少女的领袖时，她发现领袖并非是邪恶的化身，她无法否定领袖。领袖的主动想死的一番

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重要的是，要维持转换不停的善与恶的平衡”，迷惑了青豆的判断善恶正邪的心。青豆刺杀领袖的这一章节的标题是：平衡本身就是善。意味着领袖是为了平衡善而不得已作恶，我暂时将它解读为村上并不完全否定异教。男主人公天吾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里与未成年的深绘里交合，通过这种方式，天吾成了新的罪恶的领袖。男女主人公都并不完全是好人，邪教领袖并不完全是恶人。在《1Q84》里，没有道德标准，没有善恶两立，只有游离和暧昧。

青豆和老妇人虽然的确为社会除掉了虐待女性的恶棍，她们笃信自己认为值得的正义，笃信眼中的邪恶，但她们依旧是恐怖分子，依旧是异教；天吾和深绘里的交合虽说是深绘里的一种使命，但实际上天吾就是侵害了未成年少女；领袖对女童的侵犯是一种天意……没有能够单纯地判断是非，即没有绝对。可以看出，村上春树对于异教的批判，是暧昧的。这也呼应了战后日本民众的心理问题，战后的人民追捧和平，只要和平。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是恶人，所以别无选择，现在只能恶中行善。

《1Q84》创作的大背景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阪神大地震、泡沫经济破灭、天皇制残留的虚无的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宗教的追求不再是出于信仰或是对未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美好期盼，而是他们需要宗教的那种逃避式的美丽又令人愉悦的故事，来逃避这个生而为人则必定是无力而渺小的存在的残酷的现实。所以无论是宗教还是邪教，都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心灵的港湾。他们不想要做一个无力的人，不想要做一个受害者。事与愿违，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民众自己却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这部作品也深刻尖锐地暗示了这一现象。粗俗一点来说，日本人特别喜欢把牺牲者吹捧为圣人。人性一向如此，弱的一方永远能够得到同情。村上春树也是如此，他在耶路撒冷获奖致辞中运用墙与蛋的比喻表明自己总是站在击墙即碎的蛋的一方。村上把牺牲者作为这部作品的主题，这是民众的爱好也是村上作为一个日本作家的姿态。受害者在美丽新世界 1Q84 里不再是弱者，因为在那里，没有加害者。

日本文学最吸引人一点就是，她是微妙的，是朦胧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散发着爱恨交织、态度暧昧的魅力。正如文中，村上对异教领袖产生的共鸣便是对善的相对面的肯定，对恶的同情。《菊与刀》中也写到了存在于日本文化的灰色元素和日本人骨子里的矛盾——自信与自卑、等级与平等、善良与邪恶……《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所以他们的眼中没有恶人恶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平衡自己心中所认为的那份善。村上向来就不是为了表明政治立场或弘扬惩恶扬善的价值观而写作，他只是把善恶美丑的各自鲜艳的花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选择要采哪一朵花的蜜。

战后乃至八九十年代，日本天皇制仍苟延残喘于社会中，天皇制并没有因二战而灭亡，相反，它在宗教辉煌的九十年代已提炼成更加紧密严谨的体系。就像《1Q84》中的宗教团体“先驱”中的神秘的领袖，他是连接神与“我们”、是“预存了神之声的人”，是在整个体系中处于天皇地位的重要人物；抑或柳宅老妇人和青豆的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二人的关系也有异教团体的影子，老妇人是王，青豆是臣。但无论这部作品道德立场是否鲜明，这是一部对战后日本体制的思考、一部对宗教利弊的衡量、一部反近代体制的作品。宗教既是一剂使人心灵平静的良药，又是荼毒、麻痹人心的毒药。在这部作品中，村上春树明确指出了宗教的善恶正邪，但不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让我们自己去考量、过滤。

故事的最后，青豆和天吾携手逃出了 1Q84，逃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在与 1Q84 平行的 1984 的世界中，可能没有那么多可替代现实的选项，但也同样有一把秤在平衡着善恶正邪。

参考文献：

- 1、1Q84 book 2，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
- 2、菊与刀，本尼迪克特著，田伟华译
- 3、村上春树 1Q84 纵横谈，河出书房新社编辑部汇编，侯为、魏大海译
- 4、村上春树的文学迷宫，日本洋泉社编，武岳译
- 5、洗耳恭听村上春树的世界，杰·鲁宾著，冯涛译

征稿启事

《海大悦读》是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主办的读书类文化刊物，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文化交流、心灵碰撞的平台，以倡导阅读风气，促进阅读推广。每年发行两期，不对外发行出售，免费取阅。现向各位读者征稿：

1. 凡与书籍、阅读、图书馆及电影有关的随笔、访谈、书评、荐书、影评等文章，本刊都欢迎。
2. 投稿者须保证作品原创，如系抄袭或有其他侵权行为，投稿者应承担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
3. 投稿一律不退，请自行保留底稿。
4. 编者对来稿保留因版面排版需要的删改之权。
5. 投稿请发送至《海大悦读》专用电子邮箱 jhliu@shmtu.edu.cn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 1550 号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读者服务部

邮编：201306 电话：021-38284938

网址：www.lib.shmtu.edu.cn

邮箱：jhliu@shmtu.edu.cn